

孕妇信息泄露不应孤立看待

甬上辣评

过去半年，至少有一千名曾在深圳市妇幼保健院做过产检或分娩的女性，接到过母婴护理或婴儿纪念品等公司的骚扰电话或是短信，暴露出孕妇隐私信息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的问题。每一条泄露的孕妇信息都被明码标价，多数是一元。信息越精确，价格则更高，高达百元一条的信息，可以精确到孕妇的具体分娩日期。（3月15日《南方都市报》）

这是一条典型的3·15新闻，却不突兀。只要稍稍检阅下便可发现，近年来个人信息泄露事件的发生呈频密之势。因此，这次曝光的孕妇信息泄露事件虽然骇人，但不应该被孤立看待，它不过仍是孱弱的个人信息保护生态下的注脚。

信息准确、明码标价、泄露途径模糊……这几乎是当前所有个人信息泄露事件中的共同特征，它说明诸多行业所出现的个人信息泄露早已非“意外事件”、“偶然”发生，而是变得产业化。与泄露行为的高频相对应的，类似事件出现后，相关部门的回应亦往往陷入一种暧昧状态——大多极力否认“内鬼”的可能，却又对具体的泄露途径无可奉告。于是，“泄密”事件往往成为一道道“罗生门”，不仅个人信息遭遇损害的消费者维权无门，对于泄露行为的追责更是显得奢侈。这样一种维权困境与责任承担上的尴尬，无疑反映了当前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上的无力与失序。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既往个人信息保护的漏洞与风险更被进一步放大。它一方面体现在，当前个人信息使用的需求和信息痕迹已变得无处不在，而另一方面，网络的便捷又给信息窃取者和泄露者带来了便利。就此而言，在互联网+时代，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升级，越发显得必要而迫切。

然而，现实层面有关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特别是促



进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尽管在数年前就获得公共关注，进展上却严重滞后。如2003年，我国就开始起草《个人信息安全法》，并于2005年提交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意见稿，但十年过去依然止步于此。

而在今天，随着互联网+与信息社会的深度发展，对于个人隐私与正常使用信息的使用等边界与责任问题，我们都迫切需要一部具备权威性的法律来予以规范和重新定义，并以此消除公民对于信息泄露的恐惧。

个人信息安全在当下已越来越成为公民安全感和应有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能只在3·15这一天才关注到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现状，也不能孤立地看待任何一个行业所呈现出的信息泄露风险，其背后所对应的个人信息保护的阙如，是时候获得应有的制度性回应了。 朱昌俊

●热点聚焦

大学的门禁到底应该为谁而设

今春的周一至周五，郑州大学将禁止一切闲杂人员和校外机动车进入校园。当地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在网上引发新一轮讨论。记者随后发现，郑大相关通告已从官网撤下。郑大党委宣传部工作人员称，一些政策可能会有微调。

（3月15日《大河报》）

郑州大学将会出台怎样的校园门禁制度，现在不得而知。但郑大将此前的通知从官网撤下，显然是意识到了“关闭校园”的不妥，这其实是不难想到的道理。譬如新闻中就提及，不少已毕业的校友说，难道回母校怀旧一下，都不让进门？此外，如果有企业在郑大举办招聘会，那外校的学生是否就不能进去应聘了？

尽管校方表示，已把校园门卫等服务外包给了专业的服务公司，门禁等规定可能是由对方做出，但这里本质上讨论的还是高校开放度问题。历次的讨论早已厘清了类似常识：因为公共财力的投入，公立大学事实上也是公共资源的一部分，它需要向社会开放，哪怕是有限度的，以满足纳税者的合理需求。校园管理上的困难或是客观的，但这依旧不能构

成闭门的理由。

更值得追问的是：大学设立门禁，就真的保证了一种宁静与独特的气质了吗？答案不免是否定的。作为一种看得见的趋势，部分大学实际上一直在向特定的人群开放。有着一定官职的人员，往往是这些大学硕博招生中的受欢迎对象，大学对他们几乎无“禁区”。

不得不说，这正是一些大学复杂且尴尬的开放现状：一方面，出于管理的便利，极力排斥外来者进入，甚至出台刚性的门禁；另一方面，又唯恐对特定人群开放不够。其中的原因，并不难揣测。读懂了这一点，或许就读懂了大学门禁的出台，与其背后的沸沸扬扬议论。

大学当然需要安全与秩序，出台某些校园管理上的限制规定，要被理解和接受。但当大学出台不容分说的门禁令，它就不仅让人看到城堡化的大学，更看到功利化的大学。大学的门禁到底应该为谁而设？郑州大学方面表示，将对门禁政策进行微调。在舆论沸腾之后，郑州大学将如何作为，所有的围观者都在看着。 王聃

●社会观察

“一元硬币化”不如支付电子化

今后在市场上，1元纸币会越来越少，1元硬币将越来越多。央行副行长陈雨露表示，1元硬币化是全国性的统一安排，将逐步在各地推广。不过目前推广还没有时间表，会根据试点情况进行。（3月15日《北京青年报》）

硬币具有高寿命、方便自动投币、节约自然资源等几大优点，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不容易携带。正因如此，高成本生产的大量硬币躺在无数个家庭的存钱罐甚至墙角旮旯里，很多根本就没有参与流通。

如果国家不再发行1元纸币，全部使用1元硬币，当然可以倒逼民众养成使用硬币的习惯。但采用一个可以兼具硬币和纸币优点的支付方式，无疑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这样的支付方式就是电子支付。

我们知道，当前银行卡、公交卡等各种储值卡已经普及，移动支付等新兴支付手段也正在流行，这些支付方式远比硬币更有优势。比如公交车用投币方式卖票，存在容易收到假币、需要大量人工清点、去银行存储麻烦等诸多难题，在生活中甚至发生过公交公司用硬币发工资的新闻。如果全部采用公交卡，这一系列问题都迎刃而解。

有国外学者曾推算，电子支付工具的支付成本只有相应纸质支付成本的1/2到1/3，如果一个国家完全从纸质支付转为电子支付的话，则一年节约的支付成本可达GDP的1%左右。也许这样的数据有些乐观，但使用电子支付可以大大降低支付成本，是不争的事实。谁也不会否认，电子支付迟早会成为主流的支付方式。

从笔者的自身经验来看，现在就连乡镇里的小超市都办起了会员卡，一是通过积分对会员进行优惠，二是一些零钱可以存到卡里，避免了频繁找零的烦恼。而开车上高速，明显办ETC的车辆越来越多，很多收费站的ETC口也在慢慢增加。可以说，现在电子支付正在迅速普及。

当然，在偏远封闭的农村地区，或者在一些知识层次不高的老人以及流动人口等群体中，可能使用电子支付不太方便，但当电子支付普及之后，传统货币的流通频率大大降低，一元纸币的缺点就没有那么突出。所以，“一元硬币化”不如“支付电子化”，大力推广电子支付，让零钱大部分存到电子介质中，在现实中流通的少量零钱是纸币还是硬币，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刘昌海



罪感·罪槛

“徐姐，这1万块钱，你一定要收下。这40年来，我的内心一直为自己当时的过错而备受折磨。”3月13日，家住诸暨市马剑镇的施女士，特意从诸暨赶到东阳，找到了阔别40年的小学同学徐广红，并递上1万元钱，对自己当年的过错，深表歉意。

（3月15日新华社）

事情是这样的：40年前，施女士还在上小学，当时家境贫寒，没什么零花钱，有一天肚子很饿，于是偷偷拿了同学兼好友徐广红铅笔盒里的一毛钱，买了两个饼吃。

这事儿肯定不对，但放在任何一个年代，都不算什么大事，可施女士硬是愧疚了40年，历时30多年终于找到徐女士，道歉、给钱，偿了夙愿。

这事儿挺稀奇，要不然成不了新闻并被网友广泛称赞，但也不至于是独有。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报道，比如某地某某曾有小过或受人小惠，若干年后千辛万苦找到当事人，以某种方式补偿，未了总是感叹一声“终于得偿所愿”，如卸重负。

这个重负，不是外界的评判，而是心灵的负担。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别人或许早忘了，但他们就是跨不过自己心里的一道槛。这道槛，是“罪感”。

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把道德文化概括为两种：“耻感文化”与“罪感文化”，前者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后者强制力源于人的内心。直白点儿说，有“罪感”的人是按内心的道德律令生活的，一旦犯错，就算别人没察觉，也会痛苦自责；只有“耻感”的人，是依照别人的观感和外部规则行事，做了错事，被发现时才会有羞耻感，这种人有个特点，干了坏事喜欢隐瞒掩饰，缺乏自省力。

施女士这样，就是有“罪感”的人，所以即使同学早把这事儿给忘记了，即使过去40年，她依然对廉耻保有足够的敏感度。

几乎每个人都有“罪感”，但敏感度未必一样。这个敏感度，我把它称为“罪槛”。每个人干错事、坏事，都要跨过心中的道德门槛，这道槛越高，对自己就要求越严，越不能容忍自己的“堕落”，即所谓的“礼义廉耻，可以律己，律己则寡过”。可以这么说，一个人尊严的有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罪槛”的高低。

“罪槛”的高低，当然和个人境况有关。施女士经营女装生意多年，现在不缺钱，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她一样，为了一毛钱的错而奉上一万元补偿的——徐女士虽然没收下，毕竟她赎罪的心是诚的。不过，有些“罪槛”却是无论职业、性别、阶层都可以在心里竖立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底线”。

我们不敢奢谈步武前贤，因为现实，或许不得不跨过一道道“罪槛”，但这时，我们心里起码该有底线，该有是非之分，不能把“跨槛”视作当然，只有这样，才不会越走越远，最后变成是非不清、善恶不分。

吴志明

●热点快评

“吃虫眼蔬菜”因安全焦虑

很多市民喜欢吃带虫眼的蔬菜，认为这样健康、安全。北京湖西岛有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说：吃有虫眼的蔬菜是可以的，但要注意一片菜叶上的虫眼不要超过5个，否则会有健康隐患。

（3月15日《新京报》）

业内人士指出，蔬菜的不合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药的残留超标，一是微生物的超标。有虫眼的蔬菜，就可能是微生物超标。

这似乎是很纠结的事情了。吃没有虫眼的蔬菜，微生物不超标，农药残留却可能超标；吃带虫眼的蔬菜吧，农药残留的问题解决了，微生物超标的问题又来了。这种纠结真的没有办法解决了？

其实不然，只要蔬菜按照科学生产，按照标准生产，就能走出农药残留和微生物超标的困境，这两者之间并不是矛盾的，只要适度地掌握好分寸，就能让老百姓吃上健康的蔬菜。问题蔬菜的出现，说到底是一些制度和规章沦为了摆设。

“吃虫眼蔬菜”，说白了是对舌尖安全的焦虑。这种焦虑，何时才能得到纾解？ 郭元鹏